

中国明史学会

荆州市人民政府

编

# 张居正

## 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ZHANGJUZHENG  
Guoji Xueshu YanTaoHui  
LunWenji

南炳文 商传 | 主编 |

# 《张居正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编委会

(按姓氏笔画排序)

主 编：南炳文 商 传

编委会名单：毛佩琦 王广森 田 澍 李小林 张文政

张 全 孟修祥 张宪博 易法新 南炳文

赵 毅 胡 凡 胡明凯 钟 波 徐文武

高寿仙 谢 葵 商 传

执行主编：陈时龙

# 序一

## 商 传

2012年是中国历史上明朝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张居正逝世430周年。

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政治家、改革家逝世430周年，在他的家乡荆州市，由荆州市人民政府与中国明史学会合作举办了一次高规格、高水平的专题学术研讨会。

今天的荆州在明朝被称为江陵。明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在北京去世，他的灵柩被送回到家乡江陵。七十年前，朱东润教授在他的名著《张居正大传》中讲述到张居正病故后的这段历史，曾经满怀深情地说道：“六月二十日，居正舍弃十六年始终不放的政权、十年以来竭诚拥戴的皇帝和六千万人民，死在北京的寓所。”他的灵柩被送归故乡，“江陵的山水无恙罢！三十六年以前，看到一位少年入京会试，成为新科的进士；三十六年以后，又看到这位进士回来，成为功业彪炳的张文忠公”。

如今，四百三十年过去了，我们来到古荆州，看到这里古城巍峨，山水依旧；当我们来到张居正墓葬前拜谒的时候，我们的眼前仿佛再现了张居正生活的那段历史。

按照传统的说法，明朝到了明神宗万历时代，帝国已经日渐没落，是张居正的改革，挽救了这个走向没落的帝国，使之统治得以延续，史书中说：“居正为政，以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这是何等难得的政治局面！张居正也因此被称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改革家。但是当今史学界的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学者认为，张居正生活过的及其身后的那个晚明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社会转型期或者称之为社会变迁时期。作为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张居正只是顺应了历史潮流的变化，将已经发生在一些地区的“一条鞭法”推行到了全国，因此，他虽然挽救了明朝的颓势，却只能说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家。诚然，改革应该是创新，晚明时代真正的改革，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然而这也正是中国历来改革的难点。

因此我觉得这种看法可能对张居正这样的改革家有些苛求了。其实任何一位改革家，不一定都要创立什么新体制、新制度，他们所推行的新政，往往只是将已经产生的新生事物确定下来，给予支持和推广，对于一个历史时代来说，这也应该算是一个了不起的改革。改革家与一般政治家不同之处

在于他们能够推行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新政,因此,我认为张居正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不愧为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改革家。

明朝的政治体制特征之一是完备的内阁制度,明朝自中叶以后内阁逐渐发展成为国家政治的中枢,内阁的官员中,不乏名臣。然而在这样的形势下,内阁首辅的位置也成了政治家们竞相角逐的目标。张居正的时代,内阁发展到了有明一代的巅峰。在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张居正的前面,有夏言,有严嵩,有徐阶,还有他的同僚高拱,都是名著一时的内阁首辅,一个个也都在内阁的纷争中倒下。内阁首辅的位置为有野心的政治家们所觊觎,张居正也不例外,他与宦官冯保一起,用阴谋赶走同僚高拱才取而代之得到内阁首辅之位的,所以张居正也不是一位完美无缺的正人君子,更何况他也是一个讲排场、生活奢华的人。

不过这不仅是晚明官场的常态,也是中国历史上旧体制下的一种常态,不足为怪。可是问题在于张居正本人汲取了前人的教训,处处提防内阁中产生危险人物,以至其病逝之后,内阁乏人,造成明朝内阁政治的衰败,也因此影响到了晚明政局。对于这种后果,他是应该承担一定责任的。明朝的政体,在于内阁的作用。自仁、宣以后,明朝内阁支撑了帝国大厦,可是张居正以后,这个帝国的支柱却失去了旧日的光辉,皇帝和宦官成为了以后的政治主角。

徐泓教授在为韦庆远教授《张居正和明代中后期政局》一书所写序言开首便说:“对于张居正的评价,毁誉互见,瑕瑜不能相掩,是向来一般史家的共通看法。”韦先生的这部著作,不仅将张居正放到明中后期历史背景下去考量,而且对于他的成绩与错误也都给予了客观的评价,是继朱东润先生《张居正大传》之后又一部关于张居正研究的名著。

其实任何历史人物,大凡有所作为者,无不毁誉互见,其身后的评价必然会有所不同。但是张居正生前位极人臣,权倾一时,去世后即遭以神宗为首的反对派的报复,追夺抄没,家破人亡,彰显出了中国历史上改革家无法逃脱的命运。到了这时刻,反倒是几位曾经因为反对张居正而获罪的官员们站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张居正在天有灵,也要后悔自己生前的所为了吧?

我认为这就是张居正的政治局限性表现。其实对于一位改革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自己生前身后有没有人反对,或者被后来强势取代,对于改革家来说,最重要的事情莫过于自己的改革成果能够为后世所继承,而不因一个人的去世或者人事上的变动而付之东流。遗憾的是,张居正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却没有看清这一点。以致于我们今天所赞扬他的鞠躬尽瘁,



在当时也被人指为贪恋权力。好在他推行的经济政策“一条鞭法”被后人继承下来,没有随着政治反对派们的反攻倒算而废止。

中国的传统政治体制,造就了权威政治的模式。一切政策和推行,都必须有政治权威的支撑。在不同的利益群体追求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的时候,尤其如此,中国历史上所有的改革更是如此。所以张居正要想成功,就必须是个强势的政治家。强势的政治家,就必然会得罪人,树敌太多,大概是他们的共同点。何况他们所要实现的理想,往往是一般人难以明白的远景。这在中国历史上称为“事功”。《明史》在盛应期、潘季驯、王宗沐等人的传后评论说:

事功之难立也,始则群疑朋兴,继而忌口交铄,此劳臣任事者为腐心也。……所规画为军国久远大计,其奏效或在数十年后。而当其时浮议滋起,或以辍役,或以罢官,久之乃食其利,而思其功。或曰:“可与乐成,难与虑始”,信夫。

这其中的潘季驯等人也是曾经得到张居正信任的劳臣,当然也因此劳累而不能逃脱被罢官的命运。

当晚明社会在商品经济冲击下,人人都想一夜间暴富,急功近利的风气影响着整个社会心理的时候,又有谁还肯想着百年以后的远景呢?能够想着为国家的发展做一点儿事情,能够想着为后人留下一些东西,就必须具备高瞻远瞩的眼光、远大理想的追求和百折不挠的毅力。

张居正不就是这样的一位政治家么!他身后的是非,不是当时人们能够理解清楚的吧?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都必然要触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因此也就必然会有人反对,即使如张居正那样温和的改革,也曾经激起政治波澜,并导致他身后的悲剧。但是随着时间流逝,历史终究会有一个正确的结论。

我们今天纪念张居正,不仅是对于一位历史伟人的思念,更是对于他的生活与活动的那段历史的再认识,并且从中找到我们必须记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2012年12月28日于北京

(作者系中国明史学会会长)

## 序二

易法新

袍笏巍然故宅残，入门人自肃衣冠。  
半生忧国眉犹锁，一诏旌忠骨已寒。  
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眼前国是公知否？拜起还宜拭目看。

这是明末诗人王启茂(湖北石首籍)的《拜江陵张文忠公祠》，清代学者朱彝尊评价说：“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二语足称诗史矣。”

张居正(1525—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谥文忠。明代政治家，改革家，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市)人。他是与商鞅、王安石并列的我国封建社会三大改革家。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不乏起自平民而荣登宝座的皇帝，刘邦、朱元璋都以开国之君而名垂青史，但却少有出身寒微而力挽狂澜的宰相，张居正就是罕见的一位。他柄政的十年中，雷厉风行地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策，对明王朝的旧政积弊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革新。其辅佐幼主之心，经国济世之才，勇于担当的精神，多行改革的胆识，在明代的宰辅中无与伦比。他的精神世界的核心是忧国忧民，他推行新政的目标是富国强兵，他性格的主要特征是勇于任事，不畏艰险，因此被誉为“起衰振隳”的“救时宰相”。由于张居正的改革，明朝政令畅通，国家安定，人民乐业，经济兴旺，国库充实，军力强大，民族团结。这十年成为历史上最富盛名的改革期，史称“万历新政”。

然而在张居正去世后，由于改革触及了一些权贵的利益，遭致他们的怨恨和非议，也由于其生前“威柄之操，几于震主”，万历十一年(1583)三月，张居正去世后9个月，明神宗下诏追夺张居正的官秩，并抄了他的家。张居正的改革成果也大多付之东流。直到崇祯年间，后人又重新给了张居正及其改革以公正的评价。

2012年6月，在张居正辞世430周年之际，为弘扬先贤的改革精神，由荆州市人民政府、中国明史学会主办，荆州市张居正研究会承办，在荆州隆重召开了“张居正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央、省、市有关领导、海内外专家学者及张氏宗亲代表100多人参加大会。本次会议规格高、影响大、效果好。中国社科院常务副院长王伟光，湖北省委常委、宣传部长尹汉宁专门发来贺



电,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南炳文、商传出席会议并主持讨论。荆州市委书记李新华、市长李建明,给予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荆州原市委书记刘克毅同志自始至终参加会议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与会专家学者提交了60多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侧面和视角对张居正的生平事迹、改革实践、学术造诣和社会影响等进行了客观、公正、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反映了史学界对张居正研究工作的最新成果。这对于拓展深化张居正研究,提升荆州城市软实力和打造城市品牌,对于推动荆楚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和利用,都具有深远的意义。

张居正思想博大精深,是他留给后世的一份优秀的文化遗产,他所提出的一系列进步思想观点,对明、清以降的思想、文化发展都有着独到的积极作用,甚至对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开放事业、五大建设仍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我们出版这本论文集,其目的正是为了保存研究成果,扩大交流范围,启迪和推动张居正学术研究工作向更广的领域、更深的层次不断拓展和延伸。

当前,荆州正处于加快发展、科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全市650万人民正在全面实施“壮腰工程”,为打造长江经济带“钢腰”而努力奋斗。振兴荆州,亟需从古今中外改革者的改革思想、措施及其改革成就中汲取有益的成分,借鉴经验,总结教训,而张居正就是这样一座富矿。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文集的出版对加强荆州的文化建及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很强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是为序。

(作者系荆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 以史为鉴 砥砺前行

——张居正改革思想对实施“壮腰工程”的启示

李建明

历史总是在改革中前进，从春秋管仲到战国商鞅，从宋朝王安石到明朝张居正，无不以改革壮举将历史发展推向新的阶段。其中张居正以“一条鞭法”改革赋役、以“考成法”整饬吏治，振明朝于飘摇之际，救百姓于水火之中，被誉为“宰相之杰”。四百多年后，透过“一条鞭法”、“考成法”，我们依然能看到张居正卓越不凡的改革思想在历史长河中熠熠生辉。

作为从荆州走出去的明朝政治家，张居正的执政理念带有明显的封建统治阶级历史印记和局限性，但其勇于改革、破除时弊的精神，却是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其改革思想值得借鉴，颇有启示。其一心为公之心可钦，在给恩师徐阶的信中，张居正阐述了“大丈夫既以身许国家，唯鞠躬尽瘁而已，他复何言”的执政信念。其改革创新精神可敬，在满朝上下对改革顾虑重重、患得患失之际，他大声疾呼：“非得磊落奇伟之士，大破常规，扫除廓清，不足以弥天下之患。”其勇往直前之志可佩，改革遇阻时，他立下誓言：“虽机阱满前，众铍攒体，孤不畏也。”他言必信，行必果，厉行改革，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张居正实施改革之历史告诉我们，非常之目标，必以非常之精神施非常之举措。作为首辅故里，当前，荆州正处在实施“壮腰工程”、推动跨越振兴的关键时期，大力弘扬张居正改革创新精神，以“治庸问责”作为新“一条鞭法”，利剑高悬，彻底改变少数干部中存在的“庸懒散软”现象，为加快荆州振兴壮志、壮胆、壮力，意义尤显重大而深远。

## 一、壮振兴之志

行非常之事者，必先立非常之志，“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张居正青年时期就有“凤毛丛劲节，直上尽头竿”的志向，柄政之后，更是拒做平庸首辅，挺身而出，厉行改革，整顿吏治，重振朝纲，造就万历十年辉煌。加快荆州振兴，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昂扬的士气，形成强大精神气场。

壮志当坚信心。信心是成功之源。张居正始终坚信“一条鞭法”是治疗明朝衰弱的一剂良药，我们也要坚信“壮腰工程”是荆州振兴的不二选择。荆州先后被纳入全国大遗址保护示范区、国家级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全国



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国家“北煤南运”大通道水铁联运重要节点，成为省“两圈一带”战略的重要工作平台，荆州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和省的区域战略，这是我们加快振兴的信心之源。同时，荆州经济总量昂首跨入“千亿元俱乐部”，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和销售收入均突破千亿元，正在形成内联外畅的铁路、水运、高速公路综合交通网络，荆北新区、沙北新区建设正式启动，大交通、大城市的框架正在形成，这是我们加快振兴的信心之基。可以说，当今的荆州得天时、占地利、拥人和，已经走出山重水复，正在迎来柳暗花明。有信心才有作为，我们一定要有“自信人生两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自信与豪迈。

**壮志当强决心。**“有志者，事竟成，破釜沉舟，百二秦关终属楚”，这是一种誓死决战的决心。没有这种决心，“一条鞭法”可能早已夭折于重重阻挠之中。实施“壮腰工程”，我们唯有义无反顾，否则就是对历史机遇的亵渎。荆州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如今辉煌不再，一直是荆州人民的切肤之痛。打造湖北长江经济带“钢腰”、建设长江中游明星城市，是省委、省政府对我们的深情厚望，承载着荆州人民的光荣与梦想。重振昔日雄风，复兴大荆州，唯有励精图治、勇往直前，才能堪当重任、不辱使命。如果没有坚定的决心，就会摇摆不定、趑趄不前，振兴目标必将落空，我们就会辜负省委、省政府的深情嘱托，就会辜负人民群众的殷切期望，无颜面对“江东父老”。

**壮志当燃激情。**“境由心造，事在人为”。张居正以激情重燃了大明王朝行将熄灭之火。实施“壮腰工程”，激情不足则力弱。荆州自古以来就是一块激情澎湃的神奇土地，楚国先王曾在这里栉风沐雨，三国英雄曾在这里鏖战沙场，抗洪英雄曾在这里战天斗地。我们要弘扬楚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慷慨壮志，弘扬张居正“朝闻命而夕就道”的满腔豪情，弘扬抗洪英雄众志成城的战斗精神，点燃激情火焰，提升精神区位，以义不容辞之责来担当振兴重任。

## 二、壮振兴之胆

行非常之事，需非常之胆。时势创造英雄，英雄推动进步，也创造历史。历史的每一次进步，都与符合历史潮流和人民愿望的关键人物的过人胆识密不可分。没有张居正超凡的改革胆识，就没有“万历中兴”。加快荆州振兴，必须高位驱动，练就“敢为天下先”、“裹革无怯魂”之胆。

**壮敢闯之胆。**勇敢的尝试是成功的一半。荆州振兴必须敢闯敢试，敢于创新。要敢闯思想禁区，破除不可能、不敢想的思维定势，于不可能中创造可能；要敢闯改革雷区，抛弃私心杂念，拿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血性，全方位、深层次推进“顶层设计”，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

取得新突破；要敢闯体制盲区，大胆突破行政审批、项目建设、征地融资、园区环境、城市建设等方面的瓶颈制约，闯出一条发展新路。

**壮敢担之胆。**顺境逆境看胸怀，大事难事看担当。张居正以楚人担当精神而自豪：“明兴以来，国有艰巨之事，众所观望而不敢承者，率楚人当之。”担当就是要敢于负责。加快荆州振兴，要求每个荆州人都要担当。要做敢于担责的勇者，问题面前不回避，压力面前不躲闪，困难面前不推脱，挑战面前不畏惧，不达目的不罢休。要做敢于担险的智者，善于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化挑战为机遇，变风险为风景。

**壮敢治之胆。**稗草不除，嘉禾不生。张居正推进“一条鞭法”期间，以“考成”硬举措裁减冗余低效中央官员四百余人、地方官员九百余人。实施“壮腰工程”，如果慵懒散软问题得不到治理，振兴目标就会成为水中月、镜中花。要敢治思想之庸，“为官避事平生耻”，下大力纠正不敢担当、不愿担当的现象；要治能力之庸，强化学习教育，促进提能善政；要敢治作风之庸，对于作风散漫的干部要敢于亮剑，敢治、真治、善治。

### 三、壮振兴之力

非常之事，需要非常之力。海瑞评价张居正“工于谋国，拙于谋身”，后代史学家也多称他“刚毅果决”。正是靠着坚毅之力，张居正才重新塑造了一个充满生机的王朝。荆州振兴目标既定，实现目标，必须以坚韧不拔之精神，苦干、实干、快干。

**要潜心苦干。**“苦心人，天不负，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苦干是成事创业的根本保证。楚先民开创基业，“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是苦干；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夙兴夜寐，十年如一日，也是苦干。实施“壮腰工程”，如磨宝剑之锋，如筑摩天大厦，必须有磨砺不已、永不懈怠的苦干精神。苦干就是艰苦奋斗，以“人一之、我十之”的努力，发扬“5+2”、“白+黑”精神，不辞辛苦，任劳任怨。苦干就是持之以恒，发扬聚沙成塔、集腋成裘的有恒精神，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地构筑荆州振兴的宏伟大厦。苦干就是百折不挠，不被困难所阻挡、不为艰险所畏惧、不因挫折而退缩。

**要踏实肯干。**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没有。实干就是要用行动说话，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实干就是要矢志不渝，认准的事、有价值的事，咬定目标不放松，一抓到底。实干就是要踏踏实实，少说多做，不好高骛远，不好大喜功，不投机取巧，做到“踏石留印，抓铁有痕”。

**要加鞭快干。**“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张居正十年执政，创造了一个崭新的明王朝。十年之内，荆州要实现振兴目标，必须争分夺秒、奋力快干。



要加快培育大产业,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优化升级产业结构,努力培育以工业为主导、农业为基础、文化旅游为特色的大产业;要加快构筑大交通,抢抓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机遇,抓紧实施大交通发展规划,加快公路、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努力打造区域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要加快建设大城市,深入开展“四城同创”活动,实施新区开发、产业兴城、产业兴镇,建设沿江沿路城镇带,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

“潮平海天阔,风正一帆悬。”前景无限好,崛起正当时。荆州振兴,时不我待;跨越发展,义不容辞。唯有继先贤之精神,担历史之使命,振人民之士气,鼓十足之干劲,才能继往开来、再造辉煌,以“荆州气派”为构建中部崛起的战略支点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荆州市人民政府市长)

# 目 录

序一 .....	商 传(1)
序二 .....	易法新(4)
以史为鉴 砥砺前行	
——张居正改革思想对实施“壮腰工程”的启示 .....	李建明(6)
嘉靖革新视野下的张居正	
——对张居正是不是改革家的回答 .....	田 澍(1)
张居正与明代中后期的隆庆内阁述论 .....	吴仁安(9)
张居正改革群体的形成与特征 .....	冯 明(29)
张居正的考成法与当前的治庸问责 .....	王广森(43)
略论明代文官的夺情起复:以李贤、张居正为中心 .....	赵克生(45)
万历初年的张居正 .....	刘中平(51)
再论张居正与宦官冯保的联合 .....	李绍强(58)
论明末的政局走向与张居正评价 .....	刘祥学(64)
张居正与洪朝选案 .....	江柳青(73)
明“平蛮碑”与建武所之设	
——兼论张居正的民族观 .....	彭 勇(87)
张居正执政时期的女真政策 .....	沈一民(89)
张居正经营北方边务 .....	何宝善(93)
惩贪以灭盗	
——张居正对晚明地方治安问题的理解及相关的解决方案 .....	[中国香港]谭家齐(100)
张居正当国时代的中央财政制度改革	
——以太仓库为核心 .....	苏新红(109)
明朝赋税徭役制度变迁及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历史背景和影响 .....	王 波(123)
张居正抑制宫廷支出的努力及其作用 .....	林延清(129)
张居正与中国古代赋役制度改革 .....	周喜峰(133)
橘化为枳:一条鞭法的北方困境 .....	吕 杨(137)
张居正改革时期水利事业管理与运营研究	

——以黄、淮、运和三吴水利为中心 .....	展 龙 耿 勇(146)
张居正与嘉隆之际胶莱运河的治理 .....	李德楠(162)
治体用刚:张居正政治思想论析 .....	高寿仙(167)
张居正理学思想初探 .....	何威莹(177)
张居正的文化性格平议 .....	孟修祥(191)
张居正与万历皇帝 .....	王秀玲(200)
论张居正对神宗朱翊钧的教育 .....	王丽梅(213)
论张居正与万历朝的经筵制度 .....	朱子彦(220)
帝王之学:张居正及其《帝鉴图说》 .....	[新加坡]李焯然 徐之敏(229)
张居正与万历《大明会典》纂修 .....	原瑞琴(239)
张居正祖籍考 .....	孙祥宽(246)
张居正与两位山东籍官员的交往 .....	朱亚非(250)
张居正与晋商 .....	张 舒(253)
张居正与山西官商家族	
——兼谈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地主、商人、官僚三位一体的经营模式 .....	高春平 卫永红(255)
张居正与万历山西清丈探究	
——以太原府清丈个案为例 .....	高春平(263)
王世贞对张居正道德评价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刍议	
——以《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为例 .....	陈礼荣(275)
李贽评价张居正为“宰相之杰”原因探析 .....	李桂生 胡小莲(284)
试析张居正的六首轶诗和书法手卷 .....	张 全(294)
张居正《应制题百子图》与明定陵出土的百子衣 .....	姚丽荣(297)
荆州博物馆藏张居正画像题跋考 .....	谢 葵(301)
明代嘉隆万时期政治文化的嬗变 .....	赵轶峰(306)
试论嘉靖朝“银印密疏”的使用 .....	秦 博(320)
明朝“大礼议”的统嗣之争 .....	向阳鸣(336)
再论“大礼议”的核心问题及其影响 .....	吴 锐(338)
麦福与明代嘉靖朝政局 .....	齐 畅(349)
浅议万历党争的起因 .....	阳正伟(366)
明初磨勘司考论 .....	黄阿明(373)
明代捐监生入仕探究 .....	王海妍(388)
明代中后期太仆寺的财政支出、财政盈余及财政功能 .....	刘利平(394)

明代漕船漂流的规定 .....	李俊丽(408)
明代北部边防对明代军事与经济的影响 .....	胡 凡(412)
从《筹海图编》看明代海防	
——以疆界舆图为考察中心 .....	郭 渊(419)
明荆州府一带卫所与地方秩序 .....	肖立军 夏 然(426)
论明代辽东自在州南迁后的变化	
——兼及辽东行政问题 .....	奇文琪(430)
明代大同镇的职能变迁 .....	赵燕霞(440)
陈子龙的江南论 .....	[日本]森正夫著 [中国台湾]陈玉女译(445)
从精英到大众	
——晚明商业出版与文化的下移 .....	张献忠(458)
明代官窑制度与实际应用	
——兼谈嘉万以降文人的精致生活 .....	刘明杉(466)
明代荆襄地区的民间信仰 .....	陈二峰(483)
明万历年间士人的讲学活动与学派建构	
——以李材与何乔远的互动为例 .....	刘 勇(491)
万历二十六年明朝定议征讨日本本土 .....	郑洁西(501)
明季葡澳“倭奴”辨析 .....	孔 颖(506)
《明史·地理志》荆州地理考误 .....	庞乃明(513)
美国国会图书馆藏《大明舆地图》初步研究 .....	李新贵(517)
朱鹭与《建文书法儗》 .....	吴德义(523)
《金陵琐事》所见明嘉靖朝清官 .....	王雪华(526)
论明代嘉靖朝榜眼程文德的政治、文化成就 .....	龚剑锋 孙丽丽(530)
关于明嘉靖时期太医院院使薛己及其治病记录 .....	[日本]土屋悠子(537)
高拱缺失相材吗?	
——与赵毅教授商榷之二 .....	岳金西(541)
万历年间一贤令	
——湘潭知县包鸿逵述评 .....	何歌劲(554)

# 嘉靖革新视野下的张居正

## ——对张居正是不是改革家的回答

田 澍

张居正是明史研究中的热点人物之一。如何认识张居正在万历前期行政行为的特点,学界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主要聚焦在张居正是不是改革家的问题之上。“改革家张居正”似乎是一种学术主流,但仔细梳理相关成果,却发现很少有学者在明史特别是嘉靖革新的大背景下认真而全面地探讨张居正改革的对象、条件、措施、目标、障碍、效果等问题,缺乏高水平成果。否定张居正为改革家的学者也没有回答长达 270 余年的明朝有无改革期,只是就万历初政谈论张居正,相关结论自然也就没有说服力。总的来说,缺乏对嘉靖政治的理性思考并割裂嘉靖革新与万历初政的密切关系是目前张居正研究中最大的缺陷,也是张居正研究止步不前的根本原因。

由于防范异姓威胁皇权制度的严密性,明朝是中国封建时期不间断延续时间最长的王朝(唐朝有 15 年武则天改朝换代的间断时期)。它之所以能够延绵久远,除了立国体制相对完善之外,还有两次大的政治调整,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良好基础。第一次是借靖难之役而崛起的明成祖,他发展和完善了洪武体制,夯实了明代的立国基础。明太祖的开国奠基与明成祖的再造成为明代前期政治的鲜明特色,是其他封建王朝所不具有的政治现象。第二次是利用明武宗绝嗣而从湖北藩王崛起的明世宗,他利用大礼议清除了旧有官僚集团,开启了明代改革的序幕,对明代二祖之后的弊政进行了最大限度的清理。只有把张居正置于嘉靖革新的大背景下,才能确定他的改革家地位。也就是说,只有在嘉靖革新的视野下,才能认清张居正对嘉靖政治的效法与继承,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讲,张居正才是改革家。

### 一、大礼议:明代改革期产生的特殊事件

中国古代社会的改革不是彻底颠覆的代名词,更不是革命,而是在各该王朝根本体制框架内最大限度的自我更新,即在继承中相对务实的部分批判、部分否定和部分创新。当然,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而是时时处在不断变化之中,但对这一变化不能随便冠以“改革”之名。就明朝而言,明代历史在洪武、永乐体制的构架中处于动态的变化之中,同一皇帝在其前后期的施政有所不同,不同皇帝自然也有施政理念的差别,但由于父死子继基本模式的保障,新旧皇帝之间的政治断裂度不太明显,故不能将这些现象不加分析地称之为“改革”。那么,如何确定明朝的改革期呢?毋庸置疑,要进行改革,就必须首先形成改革的条件,但这个条件不是在平和的环境中一夜之间形成的,而是在激烈的甚至是惊心动魄的内部斗争中形成的。就明代改革而言,应在洪武、永乐之后的明代历史长河中断裂度相对大的时段观察从事改革的条件。相对于父死子继的即位模式,兄终弟及模式与前朝的断裂度相对要大一些。在这一时期内,先后出现了三次兄终弟及的即位模式,即朱祁钰(代宗)之于朱祁镇、朱厚熜(世宗)之于朱厚照(武宗)和朱由检(思宗)之于朱由校(熹宗)。在以上三种情形中,朱祁钰与朱祁镇、朱由检与朱由校皆为同父兄弟,又与朱厚熜与朱厚照同堂兄弟不同。很明显,后者的断裂度更大,更具改革的可能性。

但要把改革的可能性转化成现实性,仅仅是正常的“兄终弟及”也是难以完成的。因为改革的前提之一是对前朝乃至前几朝行政的批判与反思,甚至是部分的否定。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经历一次痛苦的政治撕裂和较为彻底的人事变动。换言之,改革与人事变动具有密切的关系,没有较为彻底的人事变动,就不可能在王朝体制之内进行有效的改革。所以仅仅是皇帝的变更还不足以形成改革的充分条件,同时还必须形成与皇帝变更相适应的新兴力量。当然,这种相互匹配的改革条件绝不是

某一个或某一种势力的人为导演所能实现的,而是要经过特殊事件的洗礼才能具备。明朝在正德十六年(1521)因明武宗的暴亡而带来了改革最佳条件的出现。

年仅三十岁而绝后且无预立嗣子的明武宗走完了自己荒诞的一生,对后事没有具体安排的武宗一死,立刻引起全社会的恐慌,这是明代前所未有的事情,谁来继承皇位便成了武宗死后最大的政治问题。但在皇太后、宦官和阁臣的共同努力下,较快地选出武宗堂弟、湖北安陆的藩王朱厚熜作为继承人。这一选择确保了明朝皇统的延续,暂时消除了人们的疑虑和恐慌。但选择武宗堂弟出任皇帝,却意外地带来了政坛的震荡,迎来了自明成祖以来最彻底的人事更迭。换言之,选帝过程相对平稳,而在世宗即位后却迎来了政治激荡。

武宗死后的政治震荡集中反映在“大礼议”之中。对于“大礼议”,《辞海》解释为:“明代宫廷中争议世宗本生父尊号的事件。武宗无子,武宗侄(应为从弟——引者注)世宗由藩王继帝位。即位后,使礼臣议本生父兴献王佑杭尊号。张璁等迎合帝意,议尊为皇考。杨廷和认为不合礼法,主张称孝宗(武宗父)为皇考,兴献王为皇叔父。争论三年,世宗于嘉靖三年(1524)追尊兴献王为皇考恭穆献皇帝。群臣哭阙力争,因此下狱的达一百三十四人,廷杖致死的十七人,此外尚有滴戍和致仕而去。”<sup>①</sup>作为有一定影响的辞书,《辞海》对“大礼议”的解释极不准确,是长期以来错误解读大礼议之典型代表。翻检各类论著,大多数作者缺乏对大礼议冷静而独立的见解,皆为人云亦云,以讹传讹,并以此为基础,一味地抬高杨廷和而极力贬低张璁。

众所周知,大礼议的核心是明世宗朱厚熜能否改换父母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世宗不能改换父母,世宗与孝宗是伯侄关系,与武宗是堂兄弟关系,标志着孝宗——武宗帝系的彻底断裂。随着这一问题的解决,承载前朝乃至前几朝弊政的杨廷和及其追随者被世宗彻底清除,而与前朝弊政无甚瓜葛的张璁、桂萼等中下层官员迅速崛起,在短时期内取代了杨廷和集团,组建了新君新臣全新的人事格局。世宗对张璁说:“君臣之际,固不可不严,此在朝之当慎,他处则犹家礼然。汉文帝之召见贾生,因语久而为之前席,今亦称美。故君臣不交,治功安成?卿夙夜在公,敬君尽礼,昨见退逊太过,恐非辅臣之于君者。夫何谓辅导大臣?与他臣不同,故曰‘导之训教,辅以德义,保其身体’。此则不可在朝之制相与明矣。今后凡会议,或卿有所入奏,无拘时而来,面相计处,庶裨交修。俟朕性志有定,方可广接他人,庶有所酌别贤否耳。”<sup>②</sup>正嘉之际人事更迭的彻底性和全新的人事组合是明成祖之后明代历史上独有的现象。所以说,大礼议是明代改革的起点,世宗借助大礼议清除了孝武时期的遗老遗少,培植了新兴势力,完全改变了皇位更迭之际旧臣退出政坛的模式。换言之,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中彻底翻船,不可能再掀风浪,更不可能东山再起。明世宗通过大礼议彻底粉碎杨廷和集团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成功清除旧势力的一次典型案例<sup>③</sup>。这是一个奇迹,自然孕育着新的政治气象,必然伴随着政治变革。目前学界对这一人事更迭所带来的政治变革的研究远远不够,一些学者甚至回避这一问题,而仅仅停留在同情杨廷和集团败灭的这一低层次问题上,像《辞海》一样,他们一味地放大或突现大礼议被世宗打死或惩治了几个人等问题上,借此来刺激人们的神经,并以此为基点,无视大礼议之后世宗与张璁等人的改革活动,否认嘉靖革新。

大礼议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没有大礼议,就不会形成从事变革的条件。不可否认,大礼议大大伤害了世宗与武宗之间的感情,也因此拉大了世宗与武宗乃至孝宗朝政治的距离,这就为嘉靖朝的政治变革创造了客观的、难得的改革机遇,使改革由可能性变成了现实性。这是认识明代改革必须正视的关键节点,也是认识张居正行为的基点。

① 《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页。

② (明)余继登:《典故纪闻》卷一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9~310页。

③ 参见田澍:《杨廷和与“大礼议”》,《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5期。

## 二、嘉靖革新：明代改革的黄金期

就永乐以后的明代历史而言，大礼仪无疑是一场政坛巨变。不论人们对议礼双方持何种态度，有一点是要必须承认的，那就是杨廷和集团的彻底崩溃和张璁等新兴势力的迅速崛起。而这样一次重大的人事更迭必须伴随着一场重大的政治改革。“孝—武”帝系的彻底断绝所引发的不仅仅是庙制等纯礼仪的变革，而是全面的政治革新。也就是说，世宗在全力进行礼制创新的同时，也会积极推行重大的政治变革。只强调前者，而无视后者，显然是偏颇的。世宗把变革的矛头直接指向杨廷和集团，尽一切可能清除杨廷和集团是嘉靖革新的核心内容之一。由于大礼仪最终按照武宗遗诏的明确规定承认了世宗与兴献王的父子关系<sup>①</sup>，成为不可更改的基本原则，决定着此后明代历史的走向。

对于世宗来说，从事变革的动力来自于他与张璁等人的自信。武宗去世后，政坛自然是由其培植的势力控制，杨廷和自然是武宗势力的代言人。从湖北安陆成长起来的、年仅十四岁的朱厚熜单枪匹马地前往京城继位，无疑势单力薄，弄不好便成为杨廷和集团的傀儡。杨廷和集团在大礼仪中的狂妄和嚣张也充分说明了他们根本不把嘉靖皇帝放在眼中。他们在大礼仪中公然违背武宗遗诏，强词夺理，非要强迫世宗改换父母，再次证明了他们对嘉靖皇帝的蔑视。换言之，大礼仪就是杨廷和集团嘲弄世宗、蔑视世宗的集中反映。他们瞧不起嘉靖皇帝的出身，认为只有改换父母，才能由“小宗”变成“大宗”，抬高嘉靖皇帝的身份，取得合法的继承权。然而，少年朱厚熜以充分的自信拒绝改换自己的出身，他坚持自己只是兴献王朱佑杭的儿子和宪宗皇帝的孙子。在世宗看来，藩王朱佑杭的儿子也能当皇帝，明朝的皇位是祖宗遗留下的皇位，而不是孝宗遗留下的皇位。换句话说，就是祖宗之天下，而非孝宗之天下。在大礼仪中，给人耳目一新的就是世宗的自信和敏锐，他始终未上杨廷和的圈套，不被杨廷和所宣称的“纲常”所迷惑，更没有被吓倒，而是从事实出发，敢于创造历史，最后以独立的姿态君临天下。朱东润先生论道：在英宗、世宗、神宗、熹宗等年轻继位的明代皇帝中，“世宗最能干，即位不久，大权随即到手”。<sup>②</sup> 嘉靖皇帝通过大礼仪击碎了强大的杨廷和集团，清除了施政的障碍，自然会以极大的自信从事变革。作为年少皇帝，世宗敢于担当的品格和不畏前朝旧势力的勇气是从事变革的根本保证。也就是说，嘉靖皇帝所表现出的自信、无畏与强势是改革必备的条件。

就张璁等人而言，其变革的动力来自于树立自我形象的需要。在中国传统政治中，有一种奇特的现象，一方面人们反对论资排辈，主张用人不拘一格；另一方面又对新兴势力抱以怀疑，极尽诬蔑之能事。张璁在大礼仪中不怕杨廷和集团的围攻和暗杀，挺身而出，打破一言堂，将大礼仪引向正常的争论轨道，并主导着大礼仪的发展方向，这没有无畏的勇气和超众的见识是不可能做到的。然而，在大礼仪中，杨廷和集团像瞧不起世宗一样瞧不起张璁等人的身份，攻击张璁是为了自己的升迁而讨好、“迎合”世宗。为了回应这一恶意的诬蔑之词，在钦定大礼仪之后，张璁等人便通过改革行为来回应杨廷和集团的攻击，以树立良好的形象。张璁说：“孚敬遭逢明主，宠异非常，莫知为报，惟委身忘家，敢以自许。”<sup>③</sup> 又对桂萼、方献夫、霍韬等人说：“吾辈始也生不同方，官不同位，而议礼论之同者，义理根于人心之固有也。伏遇圣明，作之君师，以定一代纲常，吾辈幸免获罪，敢复论功！夫内阁、吏部、礼部、都察院、詹事府，此何等切要衙门也。大学士、尚书、都御史、詹事，此何等切要官职也。吾辈若不能平其心思，公其好恶，各修本职，以佐收拾平之功，是负吾君，获罪于天矣。”<sup>④</sup> 张璁等人在大礼仪中经受住了杨廷和集团大肆攻击和报复的考验，这一特殊的经历练就了从事变革的品质。正如张萱所言：张璁“念以书生片言，当人主意，非久取相位，思有所报效，大要以破人臣之私交而离其党，一意奉公守法，

① 参见田澍：《明代大礼仪新探》，《学习与探索》1998年第6期。

② 朱东润：《张居正大传》，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44页。

③ （明）张璁：《张璁集·文稿》卷六《堂成告后土文》，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470页。

④ （明）张璁：《张璁集·奏疏》卷二《公职守》，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